



3月28日,多位志愿军后人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外,拉起迎接亲人回家的横幅。

志愿军遗骸归国背后的力量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的“抗美援朝战争馆”,是展示志愿军烈士功绩的地方。馆内“志愿军烈士墙”的上方镶嵌着29个金光大字:“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英名和光辉事迹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志愿军烈士墙”的中间花环中标明了志愿军烈士人数:183108人。这是目前最权威的志愿军烈士人数。而根据韩国《中央日报》的一则报道:埋骨在海外的中国军人遗骸预计为115217具,其中的114000多具分散在朝鲜半岛上。在朝鲜战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战后又因何原因导致牺牲的志愿军烈士无法回国安葬?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原来都是有名的,现在却成了无名烈士

“烈士墓地,积土垒有50厘米高,安葬完烈士后,插上烈士牌位。牌位是用桐油浸泡过的,经得起雨淋。”

3月30日,作为当年参与朝鲜战场志愿军烈士安葬工作的童志安,向齐鲁晚报记者描述当年在战场安葬战友时的情形。

不过,几十年过去后,长期以来风吹雨打的侵蚀,当年桐油浸泡过的烈士牌位早已难寻踪迹,写有烈士姓名和单位的军衣也遭腐蚀。“原来都是有名的,现在却成了无名烈士……”说起这话,童志安很难过。

3月31日,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尹继波告诉齐鲁晚报记者,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参战的志愿军部队多,作战地域广,战场情况十分复杂,大量阵亡的志愿军战士就地安葬,难以及时统计烈士数量与姓名,也有不少烈士因受伤后转运至医院甚至国内的途中死亡。

至于战后对烈士的甄别统计工作,尹继波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国家经历过一些运动,像‘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期间,关于抗美援朝的史料收集和宣传等受过很大冲击,迟迟没有走入正轨。”

据有数据记录的统计显示,1954年9月1日,非军事区双方战死人员遗骸首次交换,中朝将200具遗骸移交美方,收回了600具遗骸。这样的遗骸交换持续近一个月,“联合国军”送还的志愿军遗体,总数超过1万具。

1958年,志愿军撤离朝鲜,仅留下一个7人工作小组在板门店军事停战委员会负责善后,包括接收在韩国境内发现、转交的志愿军遗骸。

韩国1997年创设的国防部遗骸发掘鉴别团发掘出了617具朝鲜军人遗骸和385具中国军人遗骸。其中,从1981年到1997年通过板门店军事停战委员会送还了43具遗骸。

然而,除少数团以上干部和著名战斗英雄遗体运回国内葬在沈阳、丹东等烈士陵园外,大部分牺牲者仍安葬在朝鲜半岛。

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博览》曾刊文指出,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占领汉城。

此后,在“三八线”以南还进行过第四、五次战役等多次作战。因此,志愿军有相当一部分牺牲在韩国境内。

“三八线”以南的志愿军烈士遗体,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在三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1950年冬至1951年6月在第三、四、五次战役期间,在越过“三八线”进入敌占区作战时牺牲的志愿军烈士,部队在后撤时就地进行了掩埋。这部分烈士的遗体已完全腐烂,只剩下一具骨骼。

二是在金城战役中牺牲的烈士。1953年7月中下旬,朝鲜战争停战前夕志愿军发动金城战役期间,在突破敌防线并向纵深推进时牺牲的战士,在完成战役歼敌任务往后撤退时被就地战场进行了掩埋。

三是志愿军战俘烈士,即在“联合国军”战俘营死亡的志愿军被俘人员。这些人大都是有名有姓的,而且还有敌方早先交来的被俘人员死亡名单可以印证。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战事最为激烈的第三、四、五次战役都发生在“三八线”以南“联合国军”占领区。按志愿军司令部战后通报,第四次战役志愿军共歼灭南朝鲜军和“联合国军”7.8万人,志愿军伤亡4.2万人;第五次战役歼敌8.2万人,志愿军伤亡7.5万人。

近年来,民间力量不断推动着孤悬海外的英灵归国,国家层面也一直进行着相关工作。

从1997年开始,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尹继波就一直致力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建馆以来,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统计一个准确的志愿军牺牲人数。”尹继波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不过,事实上,自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志愿军牺牲人数就一直没有定论。

根据尹继波多年的研究,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参战部队、地方民政部门开始着手搜集登记志愿军烈士名单。由于没有统一统计规范,各个部门统计的志愿军烈士名单,数字出入很大,涵盖的内容也有所不同。

“11万、14万、17万、18万等,这都是近几年各方面公布的数字。”

尹继波说。

2002年,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加强了征集力量,设专人对烈士资料进行接收、整理。同时,纪念馆派征集人员常年出行全国各地,通过各地民政部门收集志愿军烈士名单。

这一调查最早在2006年有了结果,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公布了准确到“个位数”的抗美援朝烈士统计数字:183108万人。这一数字,也被记录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志愿军烈士墙”上。

除香港、澳门和西藏无报告志愿军烈士外,其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志愿军烈士。其中:福建1173人;甘肃1259人;云南1604人;江西3258人;辽宁13374人;山东19766人;吉林18499人;四川21051人;湖南11541人;河北11853人;河南11048人;江苏8444人;青海56人;重庆9468人;安徽6375人;北京1551人;湖北7183人;广西3418人;黑龙江8683人;山西5488人;内蒙古1995人;陕西3387人;广东3307人;海南91人;宁夏441人;贵州2957人;浙江3361人;上海1576人;天津808人;新疆93人。

在牺牲的烈士数量上,四川籍最多,其次是山东。

然而,在抗美援朝纪念馆收集的信息中,有部分省、市的志愿军烈士名单信息不全,如缺少牺牲地、部队番号、籍贯等;也有些地区只有人名而没有基本资料。

“除了人数的确认之外,我们需要尽可能将这些信息补充完整。”尹继波说。

与此同时,2010年8月,苗务才在北京寻找父亲战友时,得知国家正在启动运回境外烈士遗骸和修缮纪念设施的工作。

2011年8月1日起施行的《烈士褒扬条例》首次出现了有关境外烈士墓的规定:对于境外的中国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办理。

从2011年开始,民政部启动了全国烈士纪念设施普查工作,并准备到2014年10月前完成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维修改造。

2011年4月份,国家民政部、外交部、财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地设施考察和祭扫代表团,赴朝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不久,国家民政部发文,要求边境省份对境外烈士墓地进行普查。

寻找“陌生的父亲”

(上接B01版)

希望有生之年到父亲坟前一拜

苗维忠的战友王顺秀回忆起当年的战争场面,就像在诉说昨天刚发生的事情。

“1951年5月,朝鲜战争的五次战役结束时,在回撤当中,180师因前进过远,加之回撤中组织不周,被敌人包围。突围中我因生病住在六十军的第三收容所,当担架抬着我走到马坪里时,遇到了负伤的侦察参谋苗维忠。”王顺秀说。

苗维忠和王顺秀是一个司令部的,“我在管理科当指导员,他是侦察科的参谋。我们当时就有意同路突围。”王顺秀回忆,经过一夜的奔波,天亮时走到马坪里的突破口。

由于敌机轰炸没法前进,苗维忠和王顺秀就在山上树林里躲了一天,等天黑下来,他们又向前走。“我们是顺着公路走的,敌人用大炮由后向前打,再由前向后反复地追击。”

炮弹不时在他们身边爆炸。就这样白天躲晚上走,两人走了八天才走出敌人的炮弹封锁范围。路上没东西吃了,就在路边捡美国兵丢弃的食物以及搞野菜充饥。

1953年初,重振后的180师辗转朝鲜东线战场,苗维忠在上甘岭鱼隐山战斗中牺牲。539团的文化教员童志安安葬了苗维忠。

这一年年初,童志安接到180师539团首长命令,要求他在朝鲜战场东线鱼隐山前“八一站”前进包扎所负责安葬烈士工作。他们选择了一片飞机难以轰炸,大炮难以轰击的隐蔽地区,挖了42个深1.2米的烈士墓坑,作为安葬烈士需要。

当时规定,每个指战员的军衣左面口袋的背面,都写上军人的姓名和单位,避免出现无名烈士情况。童志安回忆说:“当年,我们团‘八一站’烈士墓地安葬的30多位烈士没有一名无名烈士。”

苗维忠牺牲时的景象,对童志安来说仍历历在目。

那一年的2月9日下午,担架员抬来了一位烈士,他就是师侦察科参谋苗维忠,是在宣传喊话站被炸后,为掩护战友,组织抢修设备而光荣牺牲。

“烈士抬来后,揭开掩盖的被子一看,他身材魁梧,胸部和头部负了致命伤,鲜血流出已经凝固。我点燃柴火,在汽油桶里融化雪水,用毛巾和纱布把苗维忠身上、脸上的淤血擦洗干净,由担架员抬到‘八一站’烈士墓地安葬”。

战后,1953年8月初,童志安接到命令,带领到他们团征战过的区域的各个墓地去扫墓,并添新土。1953年10月,部队奉命回国。

1954年5月底,童志安再次入朝,向志愿军政治部移交烈士墓地。入朝后,他们到各个烈士墓地,测绘了地图。历时两月多,他们向志愿军政治部移交了所有烈士墓地的手续。

1954年10月,童志安所在的部队将烈士花名册造好,由团报师,由师报军,最后存档。

2010年3月3日,苗务才以“济源烈士遗孤”的网名在网上发帖:“我今年已60多岁,希望有生之年能到父亲那边的坟前一拜。但我对那里一无所知,求有关家父信息。”

回家的路,这才刚刚开始

目前,朝鲜半岛仍有多达13万具战死者遗骸等待挖掘,韩国从未放弃对他们的搜寻。

韩国对阵亡军人的系统性发掘开始于2000年。2005年,此项工作被确定为国家永久性项目,次年,韩国正式通过《国防部遗骸发掘甄别团创设法》。截至2012年下半年,韩国共挖掘朝鲜战争战死者遗骸7009具,其中韩军6009具,联合国军13具,朝鲜616具,志愿军385具。

2011年,中国启动了境外烈士墓园和纪念设施国家保护工程。2013年7月4日,民政部表示,已基本完成了境外一百余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现状的调查摸底工作,修缮了朝鲜仓志志愿军烈士陵园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抗战将士陵园。

不过,对于确认遗骸身份最确切的DNA比对工作,政府方面仍未公开宣布具体措施。烈士后代李海放通过个人关系听到了“内部消息”:**“DNA比对工作将在不久的将来进行,不过工作量和难度比较大,所以完成时间不好预计。”**

志愿军后人、南方医科大学老师阮征宇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政府能在接收骸骨的同时进行DNA采样,并逐步建立DNA数据比样库,越来越多的烈士后人便真的能迎接父辈回家。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专家金强一表示,韩国归还中方军人遗骸这一举动象征意义比较大,标志着韩国有意完全解决以前战争时期的遗留问题,开启中韩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金强一认为,这一问题属于战争时期的遗留问题,以前冷战时期的对立理念导致韩国将这些军人视为“敌对国”的遗骸。战争遗骸的返还在世界各个国家不乏先例,这一次韩国归还中国军人遗骸数量大、较为彻底,“这是中国和韩国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作为长期研究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者,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尹继波也认为,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是对英灵的莫大慰藉。同时,在新的历史时代背景条件下,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为归国的烈士遗骸举行隆重的迎接仪式,也是国家对烈士表达最深切的怀念和敬意。

身为志愿军烈士后代和曾经的解放军一员,邓其平十分感慨,他说:“我们要牢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倍加珍惜和维护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3月29日,站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门口,康明、苗务才等人望着陵园内的志愿军烈士纪念碑,久久不愿离去。“父亲回家的路,这才刚刚开始,成千上万的烈士遗骸还在国外等着归来,今后的路还长,我们一直没有忘记……”